战略视角

找准“一带一路”的关键点

□赵 磊

“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的回答就是：关键是要敏锐地发现商机的盈利点，找准“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以务实的经济项目做支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依然不知道要卖什么，还在丝绸、茶叶、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或者认为“新三样”（高铁、核电、航天科技）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够、介入性不强。故此，中国城市和企业首先要在“买卖”等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卖什么，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此外，我们要摆脱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摆脱“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顽固惯性。例如，一说到东北就卖粮食，一说到内蒙就卖羊肉，一说到新疆就卖能源和棉花，一说到宁夏就卖枸杞，一说到广西就卖水果、橡胶和黄花梨……另一方面，要摆脱各省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惰性。例如新疆举办亚欧博览会，仅新疆企业是难以满足近50个亚欧国家商业需求的；广西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企业也满足不了东盟十国的差异性需求；宁夏举办中阿博览会，22个阿拉伯国家到宁夏发现可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找到市场的盈利点。

不要过度抬高某些国家或某些项目。不要让人感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人”。有企业家对笔者讲，中国企业原来到中亚投资，拿一个项目可能只需要10亿美元，现在对方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政治任务”，而本国又属于中国必须争取的“节点国家”，因此开始坐地要价，最后导致我们的企业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竞标一个项目，而且项目本身自然而然会延伸出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经济上讨价还价是好事，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我们往往是只赔不赚。目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先把标志性项目做好，积极去除“一带一路”过多的政治化色彩，等沿线国家主动来找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提要求、设门槛，沿线国家必然会自愿提供相关项目的落地保障。

打造优质和品牌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企业“蜂拥”而出，不分企业业绩、能力、口碑、背景等，统统喊着“一带一路”的口号，“攻城略地”，其场面颇为壮观。但是，越火热时越需要冷静，需要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进行识别管理，建立优质企业名单（红榜）和不达标企业名单（黑榜）制度，不好的企业和项目上黑榜，优质的企业和项目上红榜，国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质的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有一些海外项目出了质量问题，不仅影响其他企业的后续项目，连相关基建项目都受到牵连。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项目都和“一带一路”挂钩，出了问题必然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满与排斥。

尽快编制与完善“轻资产”名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资产”项目：港口、运河、高铁、核电、大坝……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我们再怎么低调，都会被人以高调看待，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战略意图”。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分析这些重资产项目了，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做的，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具有军工背景，所以警惕性上升。例如，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尼加拉瓜运河等，总让人感到这些项目背后的动机“不一般”。因此，我们要打造一批能够理直气壮推销的轻资产项目，如现代农业、中国餐饮、民俗文化、中医药等，但前提不是仅卖历史久远、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稀缺资源，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转化能够严丝合缝地对接国际需求，在“必需品”上做文章。美国的三片文化、双H战略，即美国最赚钱的是“薯片、芯片、影片”以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休闲娱乐+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优质教育”，值得我们借鉴。

不要忘记和冷落国内市场和需求。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由东部向西部推进。“一带一路”也要服务我国广大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内陆地区一方面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还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效释放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常常有人问：“在新疆、西藏建高铁，是三股恐怖势力利用的多，还是我们利用的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命题，而且这种意识的杀伤力绝对不亚于恐怖分子。不能因为有一小撮恐怖分子，就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福利。在西部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激励东部沿海的优质企业和负责任的跨国公司主动到西部去，既把项目和资金带到西部，也把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赏带到西部。

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没有思路就没有丝路”；第四大主体是媒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此外，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整合上述主体资源，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注重“一带一路”的细节问题。细节决定成败，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做得还远不够理想。例如，“一带一路”的英文译法较为混乱，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英文缩写。首先“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不应和“战略”挂钩（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而应强调“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那么，问题来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缩写是“BARI”，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因为它已经有特定的指代，即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巴里”。如果把Initiative去掉，缩写变为“BAR”，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酒吧”。看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虽然表述准确，但缩写困难。还有一种说法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但这同美国的“新丝路战略”很类似，而且极易让人类比成中国的中亚战略或霸权计划。笔者建议，用One Belt One Road（OBOR），政府用“倡议”，智库或学者不妨就谈OBOR，避免所有的议题都同政府对标，导致很多事物被贴上政治标签，反而对我们不利。在国际关系舞台，很多全球议题被人们熟知，往往不是其全称，而是其缩写，如WTO、FIFA等。今天，“一带一路”有了大名，也要有英文名和小名。“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要做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繁杂、要细致。

不要过度放大“一带一路”的风险。从2013年9月至今，同“一带一路”搭配最多的词汇可能是“风险”，但诸多的风险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谈，而且仅仅讲风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具体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议。其实，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把产能合作的基本内涵讲清楚。“一带一路”上的产能合作要从“三个一”入手。具体来说：“一个前提”是中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的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等。“一个条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铁路、公路、核电、电力等领域有竞争优势。上述富余产能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路径”是在沿线国家就地取材，并建立相关园区，一方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中国富余产能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合作工业化和共同现代化。当然，产能合作的升级版是基于平等与需求层面的产业合作。毕竟同产能相关的词汇往往是“过剩”“富余”，这些词汇首先不准确，是相对的，同时也容易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错觉。

把“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首先，中国希望自身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赢得尊重，不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仅仅看作是“会走路的钱包”。其次，要强调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现代化、信息化的负效应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暴力、自杀等极端事件依然是社会顽疾。故此，以“向善关怀”“正心修身”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许能够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文明互鉴解决相关国家的治理失败问题，解决深层次的国际冲突问题。再次，从本质上说，“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交流与人心亲近的项目，要让国际社会既“喜欢中国做什么”，也“喜欢中国是什么”。

总之，“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一路行、一路思，唯有找准关键点，才能攻坚克难。

热点透析

日本强推新安保法案的影响

□陈积敏

6月4日，早稻田大学教授长谷部恭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小林节、早稻田大学教授笹田荣司等三位宪法专家在日本国会下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均表示，新安保法案“违反宪法”。其中，长谷部还是日本自民党选定的法学专家，其原意在于为新安保法案的合法性背书，但令安倍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长谷部在作证时也明确指出，政府应当收回法案，因为其核心要素是允许使用集体自卫权，而这明显违反宪法。此前，有近200名宪法学者发表共同声明，以安保相关法案会“从根本上颠覆《宪法》第9条规定的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否定交战权的体制”为由，要求立即作废安保法案。不仅如此，朝日电视台对日本149名法律专家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仅有2名专家认为，日本的新安保法案符合宪法，认为违宪的受访专家比例高达98%。显然，安倍政府事先并未预料到会有这一幕。在4月份访美期间，安倍首相还信誓旦旦地向美国保证，在今夏召开的日本国会上将会通过相关法案。

这一系列事件已给一心想强推新安保法案的安倍内阁以当头棒喝，并对安倍政府野心勃勃地寻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激进政策带来重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日本的国际形象与美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新安保法案能否在本届国会顺利通过变数重重。二战后，日本构建了一系列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国家治理机制与制度体系，这决定了宪法在日本国内享有至高的地位。经过70年的发展，宪政体制与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使得日本国内的任何改革或立法措施必须严格在宪法设定的框架内推行。一旦某项政策有“违宪”之嫌，很可能会遭到抵制，并接受相关审查，以消除“违宪”之虞。根据日本的司法体制，只有当涉嫌违宪的具体法律案例先提交到地方法院之后，最高法院才有可能会对此做出裁决。并且，最高法院对于政治敏感度高的案例可能会刻意避免做出裁断。这意味着将新安保法案提交最高法院进行违宪调查的程序相当复杂，并且耗时长达数年之久。另外，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尚未出现最高法院就涉及自卫队问题的相关法案进行违宪调查的先例。尽管如此，日本新安保法案仍存在由原先的国会表决程序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可能。即便不能启动司法程序，在这一问题弄清楚之前，如果国会就一个先天不足的安保法案强行投票通过的话，极有可能产生较大的政治波动。日本法学专家小林节教授便认为，实施一项违反宪法的政治实践是一种倒退，这有可能滑向专制主义的极端。鉴于本届国会的原定会期截止为6月24日，这显然无法让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6月22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将国会会期大幅延长至9月底，这也创造了二战后日本国会的最长延期记录，其目的是留足更多时间，来消除新安保法案的诸多疑惑，以便使安保相关法案在本届国会内通过，但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

其次，安倍政府的执政基础将会有所动摇。国民的信任与支持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与执政根基。如果安倍政府利用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优势，强行推动新安保法案，罔顾民意呼声，则必将引起日本社会舆论的批评，并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2015年6月14日，约有25000名日本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大厦外抗议安倍政府的新安保法案，甚至有部分民众将安倍比作希特勒，指责安倍会把日本带入战争深渊。据日本电视台近日的民调显示，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由原先的43.5%下降到41.1%，再创其2012年执政以来的新低，其中有62.5%的受访者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63.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国会正在审议的安保法案。《朝日新闻》6月23日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如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下滑到39%，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有53%的受访者对于新安保法案持反对态度。另外，有50%的受访者支持三位法学专家的观点，而仅有17%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内阁立场。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也受到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以及社民党、共产党等均对安倍政府的新安保法案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连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也表示要尊重并虚心对待法律专家的观点。不仅如此，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前防卫厅长官和自民党副总裁山崎拓、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等也纷纷加入反对声浪之中。这已经充分表明，如安倍政府仍一意孤行，其内阁执政的稳定性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再次，安倍政府的国际形象将再受质疑。自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在外交上奉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其实质是改变二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础，强化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军事功能。为此，安倍政府在国内难以获得足够民意支持以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寻求以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外交上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更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不仅如此，安倍政府还坚持“修正主义”历史观，在发动侵略战争、实行殖民统治、强征慰安妇等问题上闪烁其词，尽显狡辩之能事。关于这一点，就连美国政府也表达了担忧与关切。安倍政府的种种做法在国内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反感以及对日本未来的忧虑，在国际上再一次令外界产生了安倍治下的日本往何处去的疑问。实际上，安倍政府在安保政策方面的激进措施极有可能背弃日本战后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引起了包括中国、韩国等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的警惕。5月14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镒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在论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日本新安保法案问题时表示，希望日本在讨论防卫政策相关事宜时，坚持“和平宪法”的精神，朝着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作贡献的方向透明地进行讨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强调，由于历史原因，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在安全领域的政策走向高度关注。希望日本能够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真正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多做一些积极有益的事。不仅如此，安倍政府右倾化的安保政策也给日本在战后所塑造的国际和平形象抹了黑。

最后，未来日美关系的发展恐将受累。众所周知，二战后日本宪政体制的确立与美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美国看来，对日本的改造是美国战后国家重建行动的成功典范，其基础就在于美国为日本制定并得到日本国民认同的宪法。尽管美国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表达了赞许之意，希望日本能够在美日安全关系中承担更多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默许日本变更、颠覆、破坏二战后的宪政基础。如果安倍政府强行推动一个有“违宪”嫌疑的新安保法案，某种程度上便偏离了美国在战后为日本发展设定的方向与选择的道路，这也是对美国日本政策的一种变相否定或挑战。从更广泛的地区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也是对战后国际体系的一种公然对抗。于美国而言，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是一项持久国家利益，这一点已经在奥巴马政府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故而，如果安倍政府不能有效解释和消除新安保法案“违宪”嫌疑而强行通过，这将会背离美国政府所一贯重视的法治原则，从而对未来美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鉴于上述种种影响，安倍政府理当三思而后行，切勿罔顾民意，恣意妄为，动摇战后日本繁荣与稳定之基础。如若安倍政府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以个别人之政治野心裹挟日本民意、绑架日本未来，不仅这些始作俑者最终必为民所弃，日本也恐将陷入新的危机之中，此非日本国民福祉之所在，亦非国际社会之所望。

上接第1版

“不严不实”的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同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就能够感同身受。把自己摆进去感受，就能更好了解老百姓满不满意、拥不拥护”。真正把自己摆进去，设身处地体会群众焦急、期盼的心情，自然就会“一枝一叶总关情”，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一些棘手的问题也就能化解了。

三是在道德修养方面，主要是解决一些干部重能力建设、轻品行修养的问题。我们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就是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没有德，再有能力我们不能用、不敢用。当前，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在立德方面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干部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体现出非常好的品行修养和坚强的党性。但也要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物质诱惑席卷而来，多元思想相互激荡。一些干部道德观念发生扭曲，台上道貌岸然、台下乌烟瘴气，带着假面具、成为“双面人”。一些干部将品行修养看作是个人的私事、不足挂齿的小事，自认为微不足道、无伤大雅。一些干部对德的标准模糊不清，甚至到了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程度。比如，一名大肆“卖官”的干部在接受组织调查时，竟理直气壮地说：我收东西是有原则的，他们都是有能力、能干事的人，没能力、不干事的送多少我都不要。一个县级市的书记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包养情妇被查处。当组织让他反思时，他却大谈个人政绩，说自己主政的几年，当地经济发展如何如何，财政收入如何如何，与“政绩”相比，自己接点收点只是“毛毛雨”，是“理所应得”的。同志们想一想，这样的价值观、是非观都偏差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道德低俗、品行不端，必然导致党风不纯、作风不正，这样的干部能力越大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就越大。

四是在行使权力方面，主要是解决一些干部公器私用、以权谋私的问题。“三严三实”当中，严以用权直指领导干部作风的核心，是对干部最经常、最现实的考验。如果使用不当，不仅伤人，还会伤己，不仅贻误党和国家事业，也会断送个人前程。真正把这个“权”字看清并不容易。现在有些干部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甚至是自己“花钱”买来的，是自己运气好、命中注定的，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便目空一切，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一位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忏悔时说：权力是我手中的一张牌，有了它，可以换来大把的钞票，再去换来更大的权力，进而捞取更多的享乐。为此，他疯狂地捞钱谋色，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最后搞得身败名裂。我们领导干部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组织上提供的待遇不薄，在社会上也有地位，得到的已经不少了。一个落马官员把自己腐败犯罪的代价归纳为“十个一”：政治上一撸到底，经济上一穷二白，名誉上一文不值，地位上一落千丈，形象上一无是处，自由上一无所有，家庭上一塌糊涂，身体上一身病痛，良心上一生自责，总体上一败涂地。《红楼梦》里有一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大家一定要懂得珍惜，要正确看待和慎重运用手中的权力，心存敬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

五是在严格自律方面，主要解决一些干部仍然心存侥幸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一个党员干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党纪国法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也相信每个同志内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人不能交，什么钱不能拿，什么事不能做，是有明确界限的。但之所以还不断有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抱有侥幸心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的人认为，现在有小毛病的人很多，不一定会查到自己头上；有的人认为，自己做事谨慎、手段高明、行事机密，查起来未必查得清；有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帮“铁哥们儿”，形成了“小圈子”“利益共同体”，可以相互遮掩保护。可哪一个出事前不是这样想的呢？这段时间，我省又查处了一些顶风违纪案件。这些人就是心存侥幸、贪心不足，有的甚至为了几百块钱的蝇头小利，搞变通、打擦边球、做小动作，直到被查处了，才追悔莫及。一名干部成长起来很不容易，付出过很多努力，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很有培养潜力，却栽在腐败上。看到他们从干部到囚徒，从光荣到耻辱，从身居要职到身败名裂，我们除了痛恨、痛心，还应该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人生不能重来，我们一定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守住做人的底线、守住党员干部的底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千万不要辜负组织和人民的信任与期待。

六是在真抓实干方面，主要是解决一些干部不求实、不务实、不落实的问题。我们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四风”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干部还是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说起来一套一套，但做起来就是不落实。一个项目今年说、明年说、年年说，但就是看不到落地。能不能把工作落到实处，这里有能力、本领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有没有责任心、想不想担当的问题。我们一些干部就是缺少一种实干精神，善于把没干的说成干的，把没影的事描绘得活灵活现；就是缺少一种攻坚克难的冲劲、狠劲，见难就躲、见硬就回，没有那种“一杆子捅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勇气和气魄。现在，吉林振兴发展的任务很重，面临的压力、困难和挑战很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大批有责任、有担当、能干事的干部。为官一任，能不能造福一方，关键就看你是不是实干。群众认干不认说，组织上更是认干不认说。我们可以容忍干部有失误，但决不会容忍干部不干事，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摘自巴音朝鲁同志2015年5月11日在吉林省“三严三实”专题党课暨专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上的讲话）